

“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上  
卷

# 张伯苓 年谱长编

梁吉生  
撰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张伯苓

年谱长编

上卷

梁吉生 撰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伯苓年谱长编. 下卷/梁吉生撰著.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9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ISBN 978-7-107-20893-5

- I. 张…
- II. 梁…
- III. 张伯苓 (1876—1951) —年谱
- IV. 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2025 号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pep.com.cn>

北京天宇星印刷厂印装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 240 毫米 1/32 印张: 18.75 插页: 6

字数: 480 千字

ISBN 978-7-107-20893-5 定价: 71.20 元  
G · 14003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7 号院 1 号楼 邮编: 100081)

## 出版说明

---

根据“服务教育，繁荣学术，积累文化”的宗旨，我社策划编辑出版了多卷本的《蔡元培年谱长编》、《叶圣陶教育文集》、《叶圣陶年谱长编》、《吴伯箫文集》、《潘菽全集》等一批重点图书，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不少图书多次荣获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和部委级优秀奖等。在此基础上，我们又策划了一批重点图书，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的《张伯苓年谱长编》便是其中之一。

张伯苓（1876—1951）是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毕生献身教育事业，亲手创办了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及重庆南开中学，并亲任南开大学校长30年。他主掌上述系列学校之校务，使南开成为中国近现代教育一个成功的范例，培养了以周恩来、陈省身、曹禺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人才。又曾担任保定高等学堂总教习、清华学堂教务长、直隶女子师范校长、北京师范大学董事、齐鲁大学董事长、东北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长、全国运动会总裁判长及国民参政会副议长、考试院院长等职。先后被授予国家奖赏及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等校名誉博士学位。其办学业绩受到国内外的高度评价，享有盛誉。从清末以来，他与教育界、文化界、宗教界、工商界、军政界许多著名人物多有往还，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文化史、体育史、政治史上都是一位不可忽视的关键人物。他的人生经历不仅是其个人事迹的编年史，也堪称我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缩影。

1986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

会联合举行张伯苓先生诞辰 110 周年纪念大会。李鹏为之题词：“绩著南开，教泽广布。”彭真为之题词：“兴办学校，改革封建落后教育的民主主义爱国教育家。”

1996 年，在张伯苓先生诞辰 120 周年之际，我社编辑出版了《张伯苓教育论著选》一书，为人们研究和学习张伯苓先生的教育事迹和教育思想，特别是其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的献身精神提供了重要文献。2006 年，为了深切缅怀张伯苓先生，继承张伯苓先生的思想财富，进一步发扬其献身教育的精神，在张伯苓先生诞辰 130 周年、逝世 55 周年及重庆南开中学建校 70 周年之际，我社特约长期从事张伯苓研究和校史研究的南开大学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校校史研究分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学校史志分会常务理事、天津教育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系列丛书》专家论证委员会委员梁吉生先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全三卷）。

本书内容丰富，条理清晰，力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选择有关张伯苓先生生平、思想、著作及教育文化活动等各方面的资料，客观、系统、全面地反映谱主一生的生活道路、教育活动、办学理念、政治趋向、思想转变和人格精神。撰著者长期精心搜集有关张伯苓先生的人事、文物、文字、图片，不仅遍及我国大陆各地，而且向我国台湾地区及美国、日本等地进行访求，获得了丰富史料，包括谱主的文稿、书信、讲话、报道、题词以及档案、近代名人著作、年谱（或日记）等；所涉张氏资料，许多内容尚属首次披露，同时纠正了不少既往所传见的史实错误。

谨以此书纪念张伯苓先生创办南开大学 90 周年、创办南开中学 105 周年。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9 年 4 月

# 序一

---

章开沅

我对张伯苓先生闻名已久，从小就仰慕这位大教育家，但真正比较全面而深切地理解其人其事，还是在认真阅读梁吉生教授的大著——《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之后。由于自己也当过几年大学校长，深知在中国办大学的艰难困苦，因此对于张伯苓苦干、硬干、穷干、拼命干的顽强拼搏精神更加钦佩。

我特别欣赏五十四年以前黄钰生教授的《张伯苓先生追悼词》，他在当时那样严酷的政治氛围中勇敢地仗义执言：“今天写历史的人，不必用公羊家的笔法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伯苓先生到南京去做蒋介石的官，是他一生的污点，他自己懊悔，他的朋友也惋惜。他这一错误，不但不必讳言，而且应该指出。指出了，才公平，才可以作为后人的教训；惟其指出了他的错误，我们对于他的贡献认识得更清楚，对于伯苓先生的崇敬，并不减少，而是崇敬得正确。”“贤哲的错误，我们惋惜、警惕，我们引为教训。我们今天所追念的是伯苓先生对于教育的贡献。他所办的学校，他所教的学生，就是他的贡献最雄辩的见证。南开，张伯苓，在人们的心中，早就成了不可分离的联想。凡是亲炙过他的教训的人，像我们这些四十、五十、六十岁的人们，谁不敬仰而又亲爱我们的老师——四十多年，为教育，为中国，辛辛苦苦，劳碌奔波，到处碰壁，失败了再起来，起来了又失败，愈失败愈奋斗，这位教育工作

者，教育家，一代人师，中国新教育的启蒙者，张伯苓先生。”

真是掷地有声的金石之言，至今读来犹可引发心灵震撼。作为南开的后辈，梁吉生教授不仅珍藏这篇悼词的油印稿，而且全文附于书后，使我们都能共赏黄先生的雄文心声，此事本身就足以警醒世人。我认为梁著张伯苓传之所以成功，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继承并发扬了黄钰生的求实存真精神与我国史家直笔的优良传统。

无独有偶。仅我所知较深的著名私立大学校长，好几位都有类似张伯苓的遭遇，如陈裕光、韦卓民、陈时等，或被迫离开母校，或多年横遭批斗，或悲惨蒙冤死去。“左”的政策导致一大批教育家的消沉乃至毁灭，这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悲剧与教育事业的极大损失。至今我还记得徐懋庸的一段“名言”，他在思想改造运动期间曾公开扬言：“投鼠无须忌器，必要时可以把鼠与器一并毁灭。”尽管他因为实在“左”过了头，而且作风又极其粗暴恶劣，受到撤职处分，但其负面影响在武汉各高校始终未能根除。因此，当我读到张伯苓晚年在亲手创办的南开受到极端冷遇随即凄凉逝去这段历史时，内心不禁为之颤抖。联想到陈时的毁家兴学，陈裕光念念不忘发扬“金陵之光”，韦卓民的口头禅“为谁辛苦为谁忙”……我们应该能够理解这一代知名大学校长的痛苦与悲愤。但更重要的还是要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尊重教育，爱护教育工作者，再也不能让过去的悲剧重演。

也正因为如此，我借《张伯苓年谱长编》出版的机会，再发一通感慨。希望这部用料真实、用功精到的年谱的出版，更有助于对张伯苓的研究，让读者对这位大教育家的精神、思想和业绩有进一步的了解，或许可以为当今高等教育（特别是民办大学）提供若干有益的借鉴。

（本序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名誉所长）

## 序二

---

张岂之

张伯苓（1876—1951）先生是20世纪中华民族杰出的教育家。其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丰富经验，是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宝贵精神财富。学界对张伯苓先生的深入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此之前，多是一般性的纪念式文章，即或在教育史上也谈到这位大教育家，可是在资料的汇集上或者在研究的深度上都有许多不足。我作为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南开中学的校友，曾于2000年著文《未完成的课题——关于张伯苓先生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研究》（发表于《重庆南开校友通讯》第4期），2001年再写《〈张伯苓与重庆南开〉述评》（发表于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出版发行的《张伯苓与重庆南开》），表述了这样的心愿：希望早日读到有关伯苓先生的研究专著。2003年年底，我收到梁吉生教授的著作《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约30万字）。展读以后，收获很多，此书概括了此前关于张伯苓先生的研究成果，有不少新见。该书是章开沅、余子侠主编的《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中的一种，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作者梁吉生教授为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文化教育史研究，着力于张伯苓先生教育思想和南开大学校史的研究。他的《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一书的附录四“张伯苓生平大事年表”，有助于读者了解伯苓先生生平的

建树及教育思想形成的轨迹。这一部分共有 40 页，分量似乎尚有不足。在此基础上，梁吉生教授开始编撰《张伯苓年谱长编》（以下简称《年谱》）。这是一部资料丰富翔实又有鲜明研究观点的书。吉生教授要我为《年谱》写序，我觉得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使我对伯苓先生以毕生的精力贡献于中国教育事业有了更加深切的感受。

吉生教授于 1959 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奠定了研究伯苓先生教育思想的基础。1977 年，为准备纪念五四运动 60 周年，他与天津历史博物馆合编《五四运动在天津》（历史资料选辑）。该书 58 万余字，1979 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1979 年，吉生教授开始撰写南开大学校史，在实践中他深感资料不足，于是到北京、南京等地查阅有关资料，随时笔记，逐渐积累，写成《南开大学六十年》铅印本。

这时，吉生教授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几万字的南开简史，不足以全面概括伯苓先生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卓越成就，需要再作精深的研究。有一件事这里应当提到，台湾南开校友会出版的纪念张伯苓先生的一篇文章说张有一个“反共遗嘱”。吉生教授感到有必要详细考订史实，以正视听。他写出长文《爱国的教育家张伯苓》，在《南开学报》1981 年第 1 期发表，不久《新华文摘》（1981 年第 5 期）转载其主要部分。此文受到各方面好评，当时任天津市图书馆馆长的南开老人黄钰生（子坚）深情地说：吉生文章中“爱国的教育家”这几个字有分量，解放了多少南开人啊！此后梁吉生教授陆续写出《张伯苓》（收入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教育名家传》）、《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张伯苓与南开大学》、《南开逸事》、《南开的脚步》、《日军毁掠南开暴行录》等书；合编《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张伯苓纪念集》，并执笔撰写 35 万字的《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编辑 70 余万字的《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参与 20 集电视连续剧《张伯苓》编剧和大型展览《百年南开》的策划并主持编写陈列大纲。这些劳绩说明吉生教

授对南开和张伯苓先生的至深感情，为他编写《年谱》奠定了坚实的研究基础。

《年谱》一书的特点是什么？我觉得其中有两主线：一是伯苓先生的爱国情怀，一是伯苓先生的所有活动都离不开作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先驱者和建设者这个主轴。这两条主线在《年谱》一书中有详细的叙述分析和独到的论说。

伯苓先生 1876 年生，1951 年逝世，一生跨越清末、民国北京政府（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及新中国成立几个历史时期。他当过北洋海军军官，教过私塾，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担任过中学和大学校长。他是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体育的赞助者和活动家。他担任过许多职务，如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等社团的主要负责人；任过多所大学的理事或董事；在政务上，北洋政府请他出任教育总长、天津市市长，后来南京国民政府又请他担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考试院院长。在国外关系上，伯苓先生曾留学美国，到日本和欧美等地的十几个国家多次考察教育。他是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等校的名誉博士。所有以上种种，都是伯苓先生一生历史的组成部分，在《年谱》一书中不能缺少，越齐全越好。在这一点上，吉生教授积三十多年搜集与研究之劳，在书中有完整的叙述，这和年谱本身要求的“详尽”完全相符。如果只是罗列，意义不大，甚至会失去伯苓先生的“自我”。吉生教授按照伯苓先生毕生的实际情况，用“爱国情怀”将各个方面贯穿起来，说明寻求民族复兴之路是伯苓先生毕生的宏愿；在寻求中应当允许走一些弯路，甚至有某些点上的失败，然而这些都无损于忠贞追求者的光辉形象。我觉得，《年谱》在这个基本点上写得饱满而又符合实际。

从《年谱》中还可以看到，伯苓先生一生接触过许多名人，广泛的交际人群，包含教育、体育、宗教、政治及社会事业各个层

面，这些在《年谱》中也有足够的反映，同样不是罗列，其中主线是为了发展中国的教育，为了建设南开。因此，《年谱》所反映的是关于伯苓先生的鲜活形象，可以永存于人们，特别是教育者的心中。

《年谱》涉及伯苓先生的讲演、函件、报告、文章、谈话、题词、手迹等，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伯苓先生毕生为中国教育、为民族复兴所做的业绩。总之，《年谱》资料丰富，文献性、揭密性强，有不少是第一次披露。因此，《年谱》一书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人物的一本研究性著作。

吉生教授在给我的信中，有一段描述了他如何搜罗与年谱有关资料的情况。他说：“笔者二十多年来，不问朝夕，奔走各地，访贤问友，或侧身故纸堆中，广事搜求，博采众言，精心考订，本着客观、公正、求真、求实的精神，不因人废言，亦不因对谱主事功的好恶，而弃片纸只字，以期真实全面地接近张伯苓，为今人和后人的研究保存更多的历史信息。”现在《年谱》即将付梓，吉生教授的劳绩已到果实丰收的季节，这是值得庆贺的。

据我所知，台湾也很重视张伯苓年谱的出版。过去台湾曾经印过赵光宸（南开校友）编的《张伯苓先生年谱》，只有五千字，且不是单独出版，而是附在1975年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8辑《张伯苓先生纪念集》后。台湾学人也期待有详尽的张伯苓年谱出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吉生教授的这本著作作为海峡两岸学人进一步研究张伯苓先生提供了优秀的研究成果。

（本序作者为西北大学原校长，教育部特别顾问，西北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 自序

---

这些年来，我主要做了一件事，思考了一个人，积累了一堆故纸。这个人，就是张伯苓先生；这件事，就是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这堆故纸，就是有关张伯苓的历史资料。

编辑张伯苓先生传记资料的心愿由来已久。这要追溯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的時候。1977年，我所任教的南开大学历史系与天津历史博物馆合作编写《五四运动在天津》，以为两年后的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作准备。5月14日，我到天津历史博物馆与该馆参与这项工作的同志一起商量编书的工作安排、编辑设想及资料搜集等事宜。两天以后，我带领历史系十多名工农兵大学生便开始了资料查阅、人物访谈等工作。在天津五四运动中，南开学校及其学生周恩来、马骏等都是重要的历史角色，南开的创办人张伯苓校长也是一位绕不开的人物。随着资料搜集工作的深入，接触了更多的张伯苓先生创办民办教育的事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历史研究者的职业意识使我萌动了一种想法，即编写张伯苓先生年谱。

1979年，我们完成了两本书——《五四运动在天津》和《五四前后周恩来同志诗文选》，两书均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年夏天，我又接受了学校编写校史的任务。因为1979年10月17日是南开大学创建60周年纪念日，这是“文革”结束后南开大学迎

来的第一个“逢十”的校庆活动。学校希望通过校庆纪念恢复和继承南开的优良办学传统，于是决定用几个月的时间撰写一本南开大学发展简史。学校对此很重视，由两位校领导负责此项工作。具体从事编写工作的是我和另两位教师。我们为了完成这个政治任务，齐心协力，加班加点，在天津市图书馆、天津历史博物馆、南开大学图书馆、南开大学档案馆查阅了大量资料，又到北京、南京的图书、档案部门进行调研，访问各地南开校友，在京、津召开座谈会，不辞辛苦，口问笔录。那时所有资料的调查搜求，只能凭手抄记。就这样，经过几个月的奋战，我写出了《南开大学六十年》。

编写《五四运动在天津》和《南开大学六十年》使我对张伯苓先生的生平、办学和思想演变历程有了基本的了解，接触了大量资料，也使我对这位已被历史尘封三十多年的教育家产生了好奇和同情。好在当时已不再是“左”得可怕的年代，风日渐暖，思想禁锢少了许多。于是，1981年我执笔写了《爱国的教育家张伯苓》的论文。这是多年来不曾多见的正面给予张伯苓先生的办学业绩、教育思想和政治态度以评价、论述的学术文章。还历史以公正，人心所向。《新华文摘》很快作了转载，引起学者和南开校友的重视，由此研究张伯苓教育思想者日多。以后几年，被历史探索的激情牵引，我撰著（或与人合编）了《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张伯苓纪念集》、《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张伯苓与南开大学》、《日军毁掠南开暴行录》、《南开的脚步》等书，而每编写一本书，同时也就进一步丰富了有关张伯苓先生的编年资料。这样年复一年地努力，由简到繁，广事搜求，爬罗剔抉，钩沉稽疑，不问朝夕，不避寒暑，积以时日，谨敬收藏，居然有了近百万言。面对经过多年翻阅、摩挲，已发黄、破损而又粘补过的稿纸，看那用铅笔、黑笔、红笔、蓝笔在不同时间加写的字迹，看那稿纸上粘贴或夹放的纸条，想到多年来探赜索隐的艰辛，使我产生了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的最初萌动和

构想。

张伯苓先生与其同时代的一些著名大家相比，没有存留下较多的文字。他不是著作等身的淹博学者，也不是善于笔耕的教育理论家。他是教育实践家，是站在教育第一线面对校内和社会上的各种情况，掌操私立南开系列学校命运的决策者、直接领导者和自觉承担者。他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学校教育的管理工作。他没有日记，没有文稿，最多的是在学校和在社会上的演讲，而这通常是事先没有讲稿的，留存下来的多是听讲者的简单记录，已很难领略演讲的精彩神韵或者鲜明的立论、透辟的分析了。尤其困难的是，这些硕果仅存的文字也缺乏汇总和整理，只能从南开过去的各种出版物的一些栏目中窥见零散的信息。由于抗日战争中日本侵略者炸毁南开大学以及南开被迫辗转南迁，学校的档案和出版的书刊损失严重，因而寻找张伯苓先生的人生踪迹，不得不从校园走向天津市内，走向北京、南京、上海、沈阳、山东、杭州、成都、重庆、自贡、昆明甚至美国那些他曾驻足之地，通过各种方法，在档案馆或图书馆中查找资料线索，更多的则是拜访历届的南开校友做“口述历史”。这样就不得不付出更多的辛劳。过往的许多时间耗费在了访问和查核资料上，许多岁月都在这种枯燥的领域中一心一意地度过了。虽然如此，我并不后悔。因为史学研究不能仅仅作单纯的文献求证，而且还要有面向社会、民间进行资料的发掘。为了尽可能多地搜求有关张伯苓的历史资料，我于2006年访问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和档案中心。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还委托美国耶鲁大学博士Sarah Coles Mcelroy（高士如）女士代我查阅美国基督教青年会档案馆的档案，得到不少可喜的收获。

张伯苓作为一个教育家，是一个复杂历史时代的复杂历史人物。从晚清时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民政府时期直到新中国初年，他在动荡的时代以其丰富的人生阅历，几乎丈量了一部中国近代史，也极富典型意义地折射了社会转型阶段中国知识分子历史道

路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张伯苓出身于清朝海军，后来弃武从文，转而办教育。由家馆先生到办中学、大学、女子中学和小学，颜惠庆称他是“办教育的状元”。他把教育从海河办到湘江、嘉陵江和沱江之滨，办到昆明。他在三尺讲台上当过教师，也任过多年的中学和大学校长；曾经出洋留学，也多次到美国、日本、欧洲访问考察；早年受洗皈依基督教，晚年加入国民党；从标榜不问政治，到竞选“国大”代表，当了三个多月的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他从天津一个普通民居中走出来，抱着“教育救国”的坚定信念，竟把一个最初只有几十人的私立学校，发展成为一个包括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的系列学府，胡适称他是“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他以“私立非私有”的办学理念赢得了社会认可，成为近代民办教育的一面旗帜。他把体育视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张德智体三育并进而偏废，强调不懂体育的人不能当校长，积极倡导和推进全民体育运动，并且早在百年前就提出中国要参加奥运会，堪为中国奥运先驱。他以创新的教育思想，提出了大学“土货化”的办学理念，义无反顾地探索教育必须适应国情的办学实践，希望世界史上有一章曰“新中国之觉悟与崛起”。他从北洋水师学堂出身的普通学子，居然出息成国内外闻达的名士，除去是南开校长，还是西南联合大学三常委之一，并且担任了许多荣誉职务，诸如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天津工商学院的校董，全国运动会总裁判长，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国参赛的领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长，故宫博物院理事，还有许多文化教育、宗教及社会公益事业的兼职，就连美国著名的大学都授予他名誉博士头衔。他结识过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人物和外国著名人士，包括教育、文化、政治、外交、体育、宗教等方面，形形色色，三教九流。国民党、共产党中都有他的学生，因此陶行知称他是“两园桃李一手栽”。张伯苓身材魁梧，声音洪亮，谈笑风生，豪爽豁达，机警而天真，急躁而慈祥，不文而雄

辩，倔强而克己。他能从辛苦中得快乐，从失败中找成功。他严肃之中又有风趣，富于理想而又极其现实。他善言谈，有鼓动力，亦庄亦谐，妙喻如环，历历如在眼前，娓娓似在耳边。他每到一处，青年学生争先恐后，满坑满谷，来听他讲演。在那国事如寒冬的岁月里，他像个不小的火盆，近之可以得到温暖、信心与勇气。老舍、曹禺称他“爱的是学生，想念的是校友”，有“一颗永远不老的心”。教育是张伯苓青年时的志愿，中年时的生命，老年时的安慰。他把一生奉献给了教育。

张伯苓先生不是一个完人，也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人，有过曲折，走过弯路。晚年，历史曾经误读这位教育家。正因为如此，追溯张伯苓颠簸踯躅、富有传奇的风雨人生，探析他那永不颓悲、执著无悔的生命历程，记录他那复杂坎坷的命运轨迹，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和研究探索的冲动，这也许会帮助人们理解那一代文人的价值追求、精神特质和内心活动。所以，我把年谱编写工作当作义不容辞的任务。

这些年来，我更多的是用学术研究带动年谱资料的搜集工作。要研究张伯苓先生某一个问题，自然会在一段时间内关注该问题的资料。我先后为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教育家传》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现代教育家和教育思想》、《天津十二大教育家》、《师范群英光耀中华》等书写了有关张伯苓的专文，在《南开学报》、《社会科学战线》、《教学与教材研究》、《人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人民政协报》、《天津日报》、《中华读书报》、《南开教育论丛》等报刊发表了《张伯苓教育思想》、《张伯苓与张学良》、《张伯苓与周恩来》、《严修、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的创建》等几十篇论文，出版了《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张伯苓与南开大学》、《南开逸事》、《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张伯苓的大学理念》、《张伯苓图传》等著作，先后接受了中央电视台、香港凤凰卫视以及上海、天津、湖

南、浙江等电视台的专题采访，还合编了20集电视连续剧《张伯苓》（2005年8月在中央电视台播映）的剧本。所有这些都深化了我对张伯苓先生的认识，对于有关张伯苓先生的历史资料进行开疆拓土式的学术搜求，也是很好的促进。

真水无香，泽积而长。近三十年来，伴着年谱资料的搜集编订，逝去的不只是时间，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也走向了中老年。一百多万字的谱稿似是跋涉前行的一步步足痕，嵌印在我的心底；就像一个没有了结的心愿，始终激励我去追求新的境界，去完成一份永恒的纪念。回忆过去的笔耕，记忆的片断犹如条条溪流汇聚到我的脑海，这回忆中既有辛劳，更有欣慰。本年谱长编无疑是认识张伯苓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存在，基本上反映了张伯苓一生的业绩，展现了他从事教育实践、政治活动、文体和宗教事功的主要经历，追踪了他的人生过程；基本上提供了一个历史人物的全宗档案，也可以说是张伯苓的履历史、生活史、思想史、精神史。倘若我的这项工作能让张伯苓在历史上留下更加接近真实的形象，并能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一些资料，为历史人物的研究奉献一点微薄力量，就是莫大的欣慰了。

梁吉生

写于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